

The Situation of “Intolerance in Public Opin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Epidemic” Fighting --Discussion on How Social Consensus Becomes Possible in the Age of Value Pluralism

Ye Zhou^{1,2,*}

¹Doctoral candidate, Suzhou University, China

²Lecturer, Jiangsu Ocean University,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23436397@qq.com

ABSTRACT

Facing the situation of "public opinion intolerance", we discuss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ublic opinion" and "the social consensus". And analyzed the different contents and forms of the social consensus under the different social states. From the social consensus's function and its formation mechanism, we can see the social consensus can make the political system, economic system,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he human society to becom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So, we have the confidence to pass the effort, from the way of core socialist values, improve the Internet environment, implement national safeguards and emphasiz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etc.

Keywords: Intolerance of Public Opinion, the Diversification Value Era, Social Consensus.

战“疫”背景下的“舆论不宽容” ——论价值多元化时代社会共识如何可能

周冶^{1,2,*}

¹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江苏苏州, 中国

²江苏海洋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江苏连云港, 中国

*通讯作者. 邮箱: 23436397@qq.com

中文摘要

在抗击新冠疫情的背景下,“舆论不宽容”的社会现象凸显,这种现象的背后,是社会共识的问题。社会共识的价值形成机制与不同社会阶段的社会结构以及社会的发展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 社会的秩序的稳定,社会发展的包容性逐渐增强,我国进入了价值多元化的时代,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趋势为社会共识的形成提供了可能。

关键词: 舆论不宽容, 价值多元化, 社会共识

1. 引言

随着我国新冠疫情的发生，网络上的各种声音纷至沓来，网民对于疫情相关的言论从未停止，引发了一系列的舆论事件。如病毒的来源争论问题、论文风波、中西医治疗的争论，包括国际上各种不同的声音等等，这些舆论事件在网上引发了大量的讨论和争论，过程中有事实真相的相撞，也伴随着各种道理的相撞、各种诉求的相撞、各种情绪的相撞，网民之间针锋相对，互不宽容，一时之间难以达成共识。事实上，这种“舆论不宽容”的现象由来已久，而“疫情”就像一面放大镜，让我们愈加清醒地意识到问题所在。在如今这种价值多元化的时代，社会个体观念的相互冲突也日益成为一种新常态，互相尊重彼此的想法，相互宽容，成为一种值得推崇的社会价值。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最需要寻求社会共识的时代。

2. 舆论与社会共识

美国的《考利尔百科全书》中，对“舆论”的解释是：“舆论是相当数量的人们对公开报道的事件、人物或事情的一组观察、意见和信念。”^[1]我国学者将“舆论”的定义简化为：“舆论是关注的表达与聚集”^[2]。“共识”（Consensus）一词来自于17世纪中叶的拉丁文“Consens Agreed”和“Agreement”，指群体成员普遍同意的观点或决定，常被翻译成“普遍合意”或“一致意见”。^[3]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共识”指“共同的认识”。^[4]“社会共识”指的是社会共同体内，社会不同成员对某事物一致的观点和看法，是社会意识的同一性。

传统社会中，社会舆论是社会共识的表达方式，但是到了现在社会，特别是现代价值多元化的互联网社会，舆论与共识相向而行，处于一种不宽容的状态之下，社会主体在对问题的看法和态度上无法形成共同意见，这对整个社会的影响都将是巨大的。首先，**社会共识是社会凝聚力形成的基础**。“社会凝聚力”指的是在社会活动里，社会组织与其成员在相同目标的指引下，基于内部吸引力进而紧密合作的相关行为，也可称为“社会向心力”。^[5]社会凝聚力的形成离不开共同目标的指引，而对目标的追寻势必要在社会成员形成共识的前提下，脱离了社会共识这个基础，一切都是空谈。如历史上著名的“靖康之祸”，即是在新旧党争不断，这样一种舆论不宽容背景下爆发的，其结果直接导致了宋王朝的灭亡。社会的存在状态是以国家为单位的，社会的凝聚力对于民族的生存，和民族的自我保障来说其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这里的“民心”，即“民意”，也就是人民的共识。在群体中，如果没有共识，就丧失了凝聚力，也就丧失了主体地位。第二，**社会共识是建构社会秩序的保障**。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离不开良好的社会秩序，社会秩序是一项给其他权利充当基础的神圣权利^[6]。这样的权利是建立在一定的约定之上的，这种约定就是社会契约，卢梭认为，社会契约中的条款虽然好像从来没有正式宣布过，但却到处都是一样，到处都得到无言的接受和承认。构建这种无需经过宣布或

强制执行，却能够得到人们认可的条款契约的过程，也是社会共识的形成过程。社会个体在达成社会共识的基础上，不再以个人的利益为第一准则，互相转让权利，形成稳定的社会秩序。如果离开了社会共识这个基础，人类将无法破除“丛林法则”的魔咒，而回到霍布斯所说的“人人是狼”的原初状态。第三，**社会共识是社会价值评判的标准**。社会价值的评判包含社会共同体中的不同成员对于某些价值原则、道德规范的肯定、认同和接受，如是非之分，善恶之分等。建立在共识基础之上的社会价值评判，可以在思想上解决因价值取向不同而引发的矛盾，并且避免进一步相争引起的冲突。社会成员在社会生活中倘若失去了共识，放弃了价值的评判，那么就只能以经济利益为价值导向，而仅仅追求当下的物质享受。马克思说，“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道德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其本身就是经济生活的产物，只要有经济生活，就必然随之产生价值评判，道德原本就是建立在经济利益的基础之上而产生出来的化解机制。

3. 社会共识的价值机制

马克思认为，在人类认识自己的问题上，并不是“先意识到自己是类存在物”，而是先有了“生产生活活动”才能认识到自己是“类存在物”，不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而是社会存在决定了社会意识。社会共识作为一种公共的社会意识，其形成和发展必然离不开社会存在的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

在中国传统社会，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小农经济是社会运行最基础的经济模式，为了加强对分散的小农经济的调节和控制，政治上采取高度集中的君权专制统治。以土地为本的自然经济属性决定了人的交往以血缘为纽带，宗法本位成为维系中国传统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和等级的秩序制度。在政治权威的强权统治下，社会的其他领域缺乏自主性和独立性，处于一种“未分化”的状态，各个领域的发展皆取决于政治，形成了稳定的“家国同构”的社会格局。在传统社会结构条件下，这种强制、稳定、唯一的“社会共识”成为整个社会共同体得以存在的前提，维系了封建社会几千年延绵不断的历史。

新中国成立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掌握大部分社会资源的分配，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紧密联系，形成了“全国上下一盘棋”的“总体性社会”格局。同时，单位和人民公社这种“单位制”的社会结构“在家庭与国家之间建立起兼具伦理、政治与经济多重功能过渡环节，使诸伦理实体具有同质性的生态关联，‘单位’既是‘第二家庭’，又是‘国家’伦理实体的具体体现”^[7]，这种共识的稳定性又在政治和文化领域得到进一步的巩固与强化，成为社会坚实的结构基础。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全民所有，集体所有的“单一”公有制结构为多种所有制结构所取代，社会结构由“一元”向“多元”转变。在

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社会生活中的其他领域逐渐与政治领域相分离，寻求各自独立的生存空间，社会的发展也依赖于各个领域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在这种转变的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方式也随之从原来的血缘式、地缘式交往逐渐向业缘式、网缘式交往转变，社会个体的个人意识越来越强，人们逐渐开始追寻个人价值和利益，原先稳定的社会共识逐步开始分化，“过度的个人主义”成为造成当代中国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紧张的重要因素。

到了互联网时代，现代信息社会的发展更加倡导理性的自由，人从被传统观念的禁锢中解救出来，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也由“一元”向“多元”转变，人们价值选择的余地增大了，思维的方向也增加了，“个人”的观念得到空前的释放。网络社会天然包含着平等、开放、合作、互动、民主的精神，拓展了人们的交往方式和范围，脱离了空间和时间等场域的限制，陌生人之间越来越“熟悉”，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愈发“频密”和公开，人格的自由和独立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网络是一把“双刃剑”，我们在看到互联网为我们带来方便的同时，也意识到时间和空间的缺场所引发的信任危机。伴随着陌生人熟悉化的同时，我们也发现熟人之间却越来越“陌生”了，比如频频发生的“杀熟”事件。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不再是面对面的交谈和沟通，在手机、电脑等新媒体的媒介掩盖下，人也被重新定义了。人们在信息的传播者和接受者之间来回切换；今天气愤于社会不公事件，明天又会在另一个事情上肆意狂欢；在任何事件中无论做何种表达，总有人站在道德的制高点进行批判。在这样一种舆论新格局下，社会共识的达成愈加困难，舆论不宽容的现象愈发明显，社会的引导面临重重障碍。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国家和民族间的交流日益密切，在“新冠疫情”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得到彰显，然而国际社会却打起了“舆论战”，在此危亡时刻，国家与民族之间如何达成共识来共同对抗病毒，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4. 价值多元化时代社会共识何以可能

在价值多元社会中，探讨社会的共识何以可能，首先要明晰多元社会的概念。“现代性概念的多元社会，强调的是社会共同体内部各个存在者的相互关系与交往方式”，所谓的“多元”并不简单指一个社会的多个利益群体，更不能粗暴的理解为群体之间的互不相容和竞争，而是在强调各个群体价值的基础上，寻求彼此之间的交往和沟通。罗尔斯在《政治自由主义》中注意到了在多元社会里，充斥着多种广包学说和价值观念，这些学说与观念有可能存在分歧，并且没有任何一种学说会被所有的公众普遍接受，但是它们的追随者却能在基本政治原则上达成稳定的重叠共识。这种重叠共识使各种社会力量和派别都能在基本政治问题上形成共识，从而形成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再如杨国荣教授在论述“伦理共识”时谈到，“所谓伦理共识，其具体内容表现为一定社会共同体中的不同成员对于某些价值原则、道德规范的肯定、认同和接

受”。他指出，各种不同的价值原则和道德规范虽然不完全相同，但可以共存，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和讨论，达到沟通和交流的目的。同样的，我们在这里讨论社会共识何以可能，是结合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要素，在接受“多元”差异，充分尊重个体或族群的价值和利益诉求的基础上，从各种不同的思想和观点中获取“最大公约数”，企望达到一种“道并行而不悖”的融合状态。

制度的优越性筑牢社会共识信心。《资治通鉴》有语：“经国序民，正其制度”，国家要稳定，人民要幸福，首要任务是制定严明的制度，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最大的优势，制度稳则国家稳，国家稳则人民幸。在此次战“疫”过程中，国家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调配全国一切资源支援疫区。各级党委和政府按照国家的统一部署安排，全面落实联防联控措施，构筑群防群治的严密防线。党员和领导干部率先垂范，医疗卫生等行业一直坚守在战“疫”一线。全国人民遵守特殊时期国家的一切要求，坚持足不出户，将“病毒”有效隔离。人民、社会和国家在战“疫”过程中形成了共识，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宗旨，向着胜利的目标共同努力，将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充分发挥，将“疫情”的发展牢牢控制住，形成了全国上下一条心，一盘棋的稳定局面。相比较一些自诩为政治制度先进的国家而言，我国在此次疫情中的表现，为人民提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也为进一步形成社会共识筑牢了信心。

经济的稳定发展夯实社会共识基础。新中国成立70余年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社会主义制度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尤其在七十年代后期，全国上下在尽快拨乱反正、集中精力搞经济等一系列重大社会发展问题上，达成了广泛的社会共识，我国经济长期处于高速发展，成功地推进了改革开放的进程。到了201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近100万亿元，居全球第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万美元大关，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的物质生活方式决定其精神的以及意识的一般状况。经济的发展直接关系到人民的物质生活方式，在物质生活得到保障的前提下，人才会去寻找更高的精神意识追求，社会就会有安宁，国家才会有发展。在战“疫”过程中，基于强大的经济实力，国家对于确诊患者全部免除医疗费用，在全民居家隔离的情况下，保障人民“米袋子”、“菜篮子”的充足，疫情缓解后，有序推动复工复产，种种方面结合起来无疑更加坚定了全国人民战胜疫情的坚定共识。

传统伦理文化凝聚社会共识灵魂。牢固的社会认同往往都建立在文化的基础之上，文化以一种无形的力量影响着人，让人们不知不觉的沉浸在一种集体无意识里。五千年来，儒家的仁爱担当、法家的权责统一、道家的知足常乐、佛教的“放得下”等各种理念相互融合，使中国人在文化、政治、道德体系等方面具有鲜明的特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的“道法自

然”、“天人合一”、“天下大同”、“克勤克俭”等丰富的人文思想和道德理念，为解决当代人类共同难题提供有益启示。中华文化最大特点是伦理道德对于个人安身立命和社会生活的特殊意义，东南大学樊浩教授团队历经十年的五次伦理大调查提供的信息显示，在“新五伦”中，排列前三位的都是家庭血缘关系，并且排序完全相同，分别为：父母子女、夫妻、兄弟姐妹。中华历史文化积淀中对“家”的重视，使家庭血缘关系在现代中国的伦理关系中依然处于绝对优先对位，社会大众对它们的共识在质的认同和量的排序方面都完全一致，可以说这是当今中国伦理道德发展的“绝对共识”。有人说中国人没有信仰，但“仁、义、礼、智、信”一直到今天，仍然是中华文化的精神内核，我们以伦理来代信仰，对传统伦理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成为探求价值共识的灵魂。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展现社会共识期待。英格尔哈特在后物质主义理论中指出，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人们的基本生理需求已经得到满足，开始追求后物质主义的生活质量和自我实现等价值追求，社会价值观念的变迁将极大的影响整个国家的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促进社会发展的最大动力，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价值多元化时代中，社会的进步，经济水平的提高，改善了人民群众的生活，人们对于生活的追求已经不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和解决温饱问题，人们期待更大程度上的个人自由，期待生活的更加幸福，期待生存的环境更加美好，期待更好的体现自我价值。“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包含了更高层次、更多角度的“后物质”和“软需求”，构成了当今社会成员期待拥有美好生活的最大共识。

5. 当代社会共识的形成路径

毋庸置疑，在价值多元化时代，“舆论不宽容”所体现的社会共识问题对于个人、社会、国家和整个人类都具有极其深刻的意义。通过思想引领、网络监督、国家保障和国际合作责任的发挥，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优化网络舆论环境，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为凝聚社会共识形成合力，不断扩大共识领域，与世界各国一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发挥思想引领责任，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作为社会的黏合剂为人们的社会活动提供了方向，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价值多元化时代中国文化建设的首要任务。通过思想引领，引导和阐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社会成员认同和接受其主要含义，在内化吸收的过程中，使之成为人们共同追求的价值目标和行为规范，在目标和规范的要求下，形成整个社会共同认知的习惯和风气，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履行网络监督责任，优化网络环境。在“网络社会”里，互联网发挥着其它媒介无法逾越的“社会雷达”功

能，网络的力量已经深度浸透到政治、经济和文化中，成为塑造信息社会的重要推力。我们一方面要发挥媒体的监督功能，抵御“污名化”之毒，净化网络空间，保障社会共识的绿色环境养成。另一方面要珍惜媒体的“可信度”赋权，立足实际，承担社会责任，在协商、交流中共建社会共识。

落实国家保障责任，力求公平正义。强化社会保障，依靠自身制度的权威性、强制性和规范性，对社会资源进行分配和调节，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力和利益，提高人民生活的福利水平，增强人民幸福感，增加民族自信心。在促进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过程中，力求做到公平正义。

强调国际合作责任，寻求共同发展。世界各国在公共卫生、经济科技、政治安全等诸多领域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全球化进程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仍然是时代的主题。中国和国际社会肩负着共同的历史任务，各个国家要在确立全球治理体系的发展方向，维护国际秩序稳定，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平和发展方面做出共同努力，扩大共识领域，重新确立新的价值体系，努力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REFERENCES

- [1] Xu xianghong, Modern public opinion [M], Beijing: China international broadcasting press, 1991, p13.
- [2] Zou Zhendong, Weak Communication [M], Beijing: National Academy of Governance Press, 2018, p21.
- [3] Judy Pearsal, The New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11, p.391.
- [4] The Dictionary Editorial Office of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Modern Chinese Dictionary (7th Edition) [M],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6, p. 458.
- [5] Zhou Linchong: On Social Cohesion [J], Journal of Xiangtan University, 1999(02). DOI: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JFD&dbname=CJFD9899&filename=XTDX902.034&v=A%25mmd2FBnJwvtboKBVQND99huK4jR4GjddTArYqN%25mmd2BQk5%25mmd2F8Zq1lnuknKSICvvikugeSK3e>
- [6] Translated by the faculty of history of foreign philosophy,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Peking University: selections of original works of western philosophy (second volume) [M],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1982, p. 75.
- [7] Fan Hao, et al. Chinese Ethics Report [M],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12, Preface, page 3.